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 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吴 茜

摘 要: 农村低收入群体家庭既是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对象, 又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 找到农村家庭致贫的关键因素,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是防止阶层固化、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利用扎根理论的方法, 探索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社会层面的诱因驱动因素、个人层面的行为驱动因素、国家层面的结构驱动因素通过“认知—情景—规范”三个维度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有助于发现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共同富裕; 农村家庭; 贫困代际传递; 影响因素; 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2)05-0124-12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2.05.008

一、引 言

中国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 人民对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更广泛的要求, 建设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成为党和国家新的工作着力点。共同富裕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构成, 其明确要求“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实现共同富裕,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当下, 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 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 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 具有较为明显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所谓贫困代际传递是指父母将贫困及其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传递给子女^[1]。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就要始终坚持反贫困的目标, 并把目标从脱贫转向防止返贫, 尤其是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共同富裕“决不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绝不能在穷的人和富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2]。因此, 如何在巩固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发现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提升农村家庭自我发展能力, 实现两代人的脱贫致富, 消除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 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在治理贫困问题上迫切需要加快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 在共同富裕视阈下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归因, 拓展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纵深, 完善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鉴于此, 本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

作者简介: 吴茜,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 576709287@qq.com (北京 100009)

哪些核心因素在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对6个地区进行深入观察与调研，探索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一定的启发。

二、文献回顾

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是一种持续性的贫困问题，使农村低收入家庭很难跨越阶层，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带来了挑战。关于共同富裕下的农民农村问题已得到学者的关注，黄承伟^[3]、傅夏仙等^[4]、李实等^[5]认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实现乡村振兴有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夏英等^[6]、侯银萍^[7]、黄祖辉等^[8]建议推行《乡村振兴促进法》、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新型城镇化来实现共同富裕，但是以消除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为角度的共同富裕研究却较少。当下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主要从贫困代际传递的实证测量、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阻断路径三方面展开。

第一，基于公平公正、全民富裕视角下的贫困代际传递实证测量。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和韦伯思想。他们强调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但社会的不平等会加速贫富群体的分化和交往的疏离，导致贫困阶层固化和贫困的恶性循环^[9]。为了测量这种不平等程度，Becker等^[10]基于人力资本传递视角最早建立了代际收入流动性测度的理论框架，通过计算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贫困代际传递程度。Gary^[11]在克服前人不足的基础上，利用收入均值法和工具变量法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估计，来代表贫困代际传递程度。Gary测量的美国代际收入弹性至少有0.4或者更高，与先前研究者描述的美国社会相比具有更低的代际流动性。Gary^[12]在比较各国代际收入流动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代际收入流动中跨国差异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Gary^[13]等对先前的研究做出了比较系统和完备的梳理。社会流动理论认为，在一个流动率较低的社会，个人向高收入阶层流动较为困难，穷人及其后代陷入“贫困陷阱”的可能性较大。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富裕家庭，贫困家庭子女将来更有可能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卢盛峰等^[14]、张立冬^[15]、王海港^[16]借助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贫困代际传递趋势做出了整体判断，认为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易引发贫困代际传递。杨沫等^[17]针对农村家庭展开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的贫困代际传递程度有所减缓。马文武等^[18]、肖殿荒等^[19]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实证结果展开对比，均发现相较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更加明显。

第二，基于物质与精神层面、全面富裕视角下的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一是物质方面：要素短缺理论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要素的短缺，这些要素具体包括资金、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当这些资本持续短缺时，就会使家庭内部两辈或多辈陷入贫困。家庭内部资源的多少会影响父辈对子辈资源的分配，当孩子较多而资源较为匮乏时，就容易导致贫困代际传递^[20]。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教育关联会反映在子女的收入、职业状况、职业地位，并产生一定的代际传递^[21]。地理位置和环境资源会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发生。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均认为持续性贫困是经济不发达造成的^[22]。在落后的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很难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不利于增加他们的收入^[23]。环境污染不但使人们寿命减短，还减少农民靠自然资本获得的收入，容易影响整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和正常收入，造成贫困代际传递^[24]。二是精神方面：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理论认为受贫困文化影响的群体会将生产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和行为等传给下一代，造成贫困代际传递^[1]。长期享受福利政策的家庭会产生福利依赖，使子辈也失去了工作与创新的热情，陷入政策福利救济的陷阱^[25]。单亲家庭和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或单母亲家庭），其子代更容易陷入贫困^[26]。恶劣的生长环境会对子女的身

心健康造成伤害，家庭暴力、酗酒、犯罪等都会导致子女遭遇贫困^[27]。

第三，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路径。在个人层面，转变家庭生计策略和改变家庭环境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鼓励农村家庭由从事农业活动转为农业与非农业相结合或从事小型贸易来提高家庭收入，加大农村家庭生计资本的积累程度，多样化开展农户生计活动^[28]。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子代提供优质资源，充分激发家庭内生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29]。父母吸烟或酗酒都加大了子代吸烟或酗酒的可能性，父母如果停止这些不良嗜好或是减少在家发生这些不良习惯的频率则能够有效改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30]。在社会层面，社会排斥的消除有助于提高贫困家庭的劳动积极性与自信心，增加家庭收入，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31]。增加贫困家庭的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贫困代际传递的几率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就业率的提高有助于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32]。在政府层面，Solon^[11]认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在提高个人人力资本的作用上比家庭支出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代际收入弹性中约 1/3 的部分来源于政府投资，公共支出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贫困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在中国，为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潘星宇等^[33]、肖殿荒等^[19]认为要发挥基层政府在贫困精准识别中的信息优势，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提高向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邓锁^[34]认为儿童发展政策的介入有助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该政策可从儿童发展账户、发展性的家庭与儿童服务、得到更多社会性政策的支持这几方面展开。Villa^[35]指出，通过“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改善儿童早期的营养状况和增加教育年限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进一步地，如果在青年时期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其成年后的收入水平会更高。Bird 等^[31]认为可通过法律途径来赋予相对贫困群体更多的权利，同时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综上，学界对贫困代际传递进行了探讨，但仍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1）质性研究较为少见。大部分研究多采用代际收入弹性法、代际收入转移矩阵、分解法等定量的研究方法对贫困代际传递展开研究，较少采用质性研究。定量分析只关注单一的因果模式，容易忽视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缺乏共同富裕视阈下符合本国国情的理论分析框架。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多来自于西方社会，但是要研究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还要结合其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展开探讨。因此，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探索能解释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本土化理论，解决不平等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还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探索共同富裕视阈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36]。扎根理论的主要操作程序如下：（1）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从中提炼出概念；（2）将资料和概念进行反复对比，在访谈时询问与概念有关的理论性问题；（3）在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发展成理论概念；（4）对资料编码并进行理论抽样；（5）建构理论，使理论更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为了更好地系统化处理和资料、挖掘资料的范畴、识别范畴的性质以及范畴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质性资料分析工具 Nvivo12 软件。

（二）样本选择

扎根理论强调从实际经验中获取资料，形成理论以解决问题，本文研究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以农村家庭中两代人都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为研究对象（将子辈出生时户籍类型为农业户籍的家庭定义为农村家庭）。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该研究对象涵盖了全

国不同地域的实地资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选取 2018—2019 年吉林省、甘肃省、湖北省、江西省、福建省入户的农村家庭中两代人都是贫困的状态，后来 2020 年脱贫后又选取河南农村家庭中两代人都是相对贫困状态的家庭进行调研，以进行补充与完善。第二，该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更有利于挖掘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发掘新的概念和理论。因此，本研究基于代表性、典型性和样本资料的可获得性，选取吉林省公主岭市、甘肃省静宁县、湖北省巴东县、江西省于都县、福建省诏安县、河南省淮阳县的农村家庭两代人都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为研究对象（如表 1 所示），进行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扎根分析。

（三）资料来源

在资料来源上，本文围绕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主题展开，在资料的收集上，根据三角验证原则，本文采用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以资料来源的多样化来保证资料的信度和效度。具体而言，（1）一手资料：包括与农村两代都贫困的家庭面对面访谈和县、乡镇扶贫干部的会议座谈与电话访谈，并在访谈过程中形成备忘录。同时，为了使资料有一定的完整度与准确性，访谈后及时对相关内容进行整理与分析，通过第二天回访的形式或事后电话访谈的方式对调研资料中信息缺失、语句歧义的地方进行补充和纠错，形成访谈记录。（2）二手资料：国家乡村振兴局网站、全国扶贫教育中心网站、地方乡村振兴局网站等政府部门官方网站，政府会议及讲话，各个媒体平台报道、地方扶贫公众号与微博、知网收集的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文章。在与农户和扶贫干部的访谈中，作者有意向访谈人员进行提问，判断从实际调研中获得的信息是否与公开的信息一致。同时，将访谈资料与备忘录进行比对，确保从数据中得到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四、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本文资料采用 Nvivo12 质性分析工具，通过开放式编码提炼概念和初始范畴，在通过主轴编码形成副范畴、主范畴，最后通过选择性编码归纳出核心范畴，寻找各范畴之间的关系并构建理论。通过“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引出概念—提出问题—资料收集”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以概念为导向进行理论抽样，修改和完善概念和范畴，直至达到理论饱和。通过挖掘全国 6 个地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共性，研究完成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归纳和理论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从资料中挖掘概念，发展概念的属性和维度，并进行范畴化，实现案例中的原始资料向范畴转化。分为三步：（1）概念化。对访谈资料和案例资料进行整理，将原始资料整合成概念，从属性和维度对这些概念进行阐述。（2）范畴化。将整合后的原始概念重新对比分析，把相似

表 1 受访农村家庭情况

基本情况	类别	数量	比例
户主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30 个	63.8%
	初中~高中	17 个	36.1%
	大学及以上	0	0
家庭人口数	≤3	20 户	59.3%
	4	12 户	22.2%
	5	8 户	11.1%
	≥6	7 户	7.4%
享受低保人数	0	135 个	71.4%
	1~3	42 个	22.2%
	≥4	12 个	6.4%
劳动人口数	0	35 个	18.5%
	1~2	112 个	59.3%
	≥3	42 个	22.2%
贫困户属性	一般户	40 户	85.1%
	低保户	5 户	10.6%
	五保户（有后代无行为能力）	2 户	4.3%

的概念贯穿在一起形成初始范畴。(3) 丰富范畴。将两个案例放在一起进行差异化比较,发现相同和不同之处,如果发现与被编码过的案例在概念上相似的案例,就赋予它们相同的类型,放在同一个编码下。不断增加被编码案例的一般属性和维度,直到达到理论饱和^[37]。经过反复的比对分析,从6个地方的案例中提炼出22个概念,并形成9个初始范畴。限于篇幅,表中的每个初始概念仅用一个语句代表(如表2所示)。

表2 开放式编码及范畴化

范畴	初始概念	原始语句
就业与创业政策	人才培养政策	虽然通过小额扶贫贷款我买了一头母牛,但是以前没养过牛,没有养殖经验,我也不识字,看不懂养牛教材,养的母牛也没能生下牛仔
	产业化政策	我们村里山多地少。以前在外面打工,我视力不好,吃了不少苦。听一起打工的人说回老家可以搞种植,但是我们村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种植业,我是想努力而没门路,儿子也跟我一样的遭遇
社会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	我和孩子妈妈只是在城里打零工,也没有当地户口,孩子不能跟着我们到城里上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我们又上不起,如果生病了看病更看不起了
	人口结构	现在农村有劳动能力的人会选择出去打工,农村老龄化、空心化严重,留守儿童居多。农村家庭两辈都贫困的,大多是没有劳动力
贫困文化	家庭文化与价值观	父亲做生意失败欠债在家,没事就打牌喝酒,对社会怨气十足。有一女儿初中毕业,没技能也不出去打工;儿子中专毕业后也不找工作,天天睡睡喝喝,还加入了黑社会。村里干部多次动员,都无效。父亲与儿女沟通甚少,一说话就吵架
	村庄文化与风气	村里有的家庭父子俩在家闲着没事也不出去挣钱,就在村里聚堆打牌喝酒
	教育期望	家里本来就没有钱,孩子还多,还上什么学啊,老大五年级毕业我就赶紧让他出去打工了,给家里寄些钱回来才要紧
	父母教育水平	我们自己都不识字,怎么教育孩子啊。虽然我们也尝了没文化的苦,但是我们真的没钱也没能力让孩子上那么多年的学
社会排斥	福利依赖	村里一部分村民形成了好吃懒做的情性,有的两代人都不工作,挂着贫困户的头衔靠国家政策获得收入
	遭受歧视	在城里打工,大人和孩子经常会被城里人瞧不起,嫌我们脏,没文化,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懂
	话语权缺失	村里的很多事情我也不太懂,我爸和我都参加了表决,我感觉也没多大作用,好像都是当官的说了算
自然资本	资源可达性	扶贫资源常常集中在乡村精英的手中,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获得的机率较低
	土地	家里的地不多,整个家庭的收入都是靠土地获得
物质资本	水	以前这个村的水被污染过,有的家庭两代人都得过癌症
	住房	我家的房子有裂缝,一到下雨天就会漏水,我们一家人将就着住了好多年
	耐用消耗品	我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井水,我只能到山上一桶桶的打泉水。我们家大人孩子一周才洗一次头。用洗衣机洗衣服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想到,家里也没有这些电器
金融资本	债务	SQ 贷款在外面做生意赔本了,父母生病,老婆孩子在家务农,自己一个人在家瞎折腾。SQ 多次被催债还款,欠款达十多万,最后被法院带走

续表 2

范畴	初始概念	原始语句
	信贷	小额扶贫贷款由于贫困户信用评级不达标，HJPZ 村目前无小额信贷。很多贫困户在 60 岁以上，基本上享受不到国家这项政策
	储蓄	一年下来基本没有怎么存钱，挣的钱基本都花光了
社会资本	社会关系	我们平时打交道多的就是村里乡里乡亲，不认识社会上能帮上什么忙的人。孩子想让我托熟人帮他找工作，我是真不认识
人力资本	劳动能力与健康状况	我们家就靠我一个人挣钱，我儿子是瞎子，娶了一个双腿残疾的媳妇，经常挣的钱不够花
	知识、技能	我上初中时不爱学习，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在上学，父母就让我出去打工了。在深圳打工的时候，因为没有上过学，就不能担任领班以上的职位。所以我就自己默默学习，希望掌握了电脑技能就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

(二)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通过对初始范畴分析和分类，挖掘和建立初始范畴之间的联系，并依次聚类和命名，层层提炼出副范畴和主范畴，发展其维度和属性。在主轴编码阶段，本文共归纳出 9 个副范畴和 3 个主范畴，具体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和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关系内涵
国家—宏观层面诱因	就业与创业政策	当就业与创业政策没有起到良好的执行效果时，会使农村贫困家庭享受不到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人才培养政策带来的创业机遇
	社会结构	城乡二元制度使农村家庭无法像城市家庭一样享受公共服务，待遇的不平等使贫困家庭及其后代无法真正地摆脱贫困
社会—中观层面诱因	贫困文化	贫困家庭内的消极、懒惰、不思进取的价值取向以及村庄内体现的内生动力不足、赌博、喝酒、彩礼过多等风气会严重影响贫困家庭下一代的成长与发展
	社会排斥	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在社会上因语言、外貌、身份、地位等因素而遭到社会歧视，无法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
个人—微观层面诱因	自然资本	土地资源没有形成现代化和产业化规模；土地存在荒废的现象，利用率较低；存在水资源污染和空气污染，引发各种慢性疾病或癌症，因病导致贫困代际传递
	人力资本	因疾病或遗传因素缺乏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体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相应的技术能力欠缺，抗风险能力差，极易陷入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物质资本	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几代人都没有良好的住房条件，缺乏家电和生产用品，牲畜数量较少
	金融资本	父辈收入低，经常入不敷出，无存款，甚至还有贷款，没有多余的物质资本投资其他方面，子辈享受不到父辈金融资本带来的优势。有的家庭申请小额扶贫贷款却不从事相关产业，而是用来直接消费，整个家庭仍处于贫困状态
	社会资本	缺乏社交，没有多余的钱投入社交；社会阶层较低，无法与更高阶层的人融入；信息传递链封闭，没有社会关系网。子辈继承了父辈的境遇

(三) 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

选择性编码是对主轴编码的再次提炼与整合，对主范畴、副范畴和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构建核心范畴，并以“故事线”的方式描述各个范畴之间的脉络与链接关系，形成理论模

型。通过不断的精炼与分析，本文提炼出“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这一核心范畴，在这一核心范畴下衍生出国家—宏观层面结构驱动因素、社会—中观层面诱因驱动因素、个人—微观层面行为驱动因素这3个主范畴，就业与创业政策、社会结构、贫困文化、社会排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这9个副范畴。

基于范畴之间的研究结构，本文将“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确定为核心理论模型，围绕这一范畴形成的故事线为：农村贫困家庭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遭遇的社会排斥对农村贫困家庭中两辈或三辈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形成了社会环境下的认知；人的经济行为是镶嵌在社会心理和国家制度之中的，农村贫困家庭根据家庭拥有的生计资本，产生一系列有限理性行为；在国家宏观就业与创业政策、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结构因素内在于农村家庭成员的社会行动，对行动具有约束性和使动性，它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起了促进或抑制作用。由此可见，认知维度促使社会层面的诱因驱动因素形成，情景维度促进个人层面的行为驱动因素产生，规范维度引发国家层面的结构驱动因素强化。因而，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可被描述为“认知—情景—规范”三个维度下的“社会层面诱因驱动因素、个人层面行为驱动因素、国家层面结构驱动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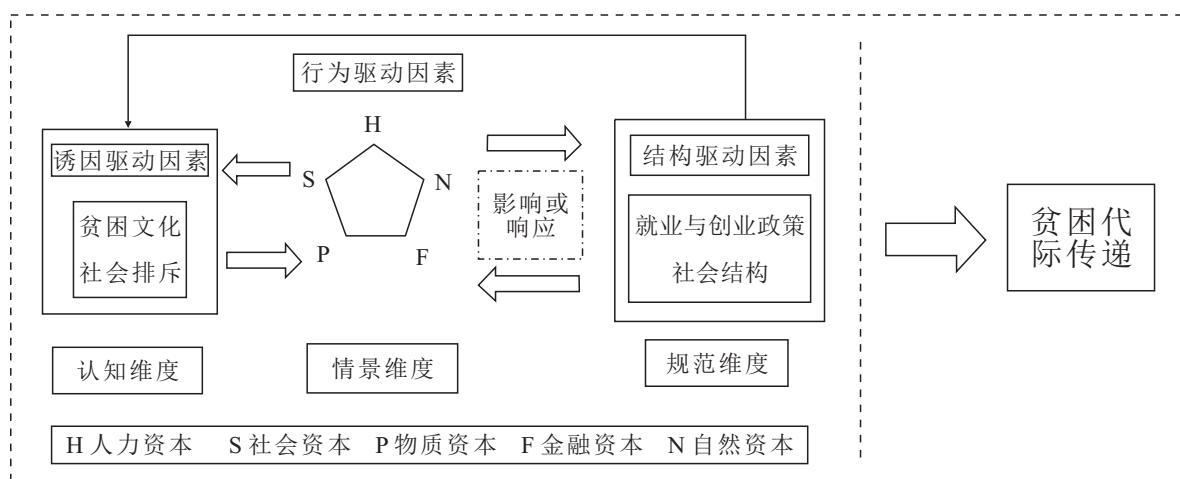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研究者不能再获得其他的资料来形成新的范畴^[38]。本文将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并导入Nvivo12软件中进行编码分析。在对上述资料进行三级编码过程中，没有发现新的范畴，而且范畴之间也没有产生新的关系，表明核心范畴已经发展完善，这也意味着图1所构建的理论模型通过了饱和度检验，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

五、研究发现

（一）认知维度促进社会中观层面诱因驱动因素形成

认知是农村家庭成员依据长久形成的思维方式对周围环境进行的解释和评价，它是一种深层次的诱因驱动因素，对农村家庭影响较为深刻，因此难以轻易改变。认知维度的因素是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中的逻辑起点，它是其他两个维度的基础。社会层面的认知维度包括贫困文化和社会排斥这两个驱动因素。

贫困文化是贫困家庭长期形成的脱离主流文化的特定文化体系，它是一种内在的认知体系。这种脱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贫困个体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贫困者后代产生重大影响，形成自我维持和不断复制，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由扎根理论可知，本研究的贫困文化包括家庭文化与价值观、村庄文化与风气、教育期望、父母教育水平、福利依赖。家庭文化与价值观是子辈从父辈受到的最直接的影响，子辈很容易继承父辈消极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习俗，继而缺乏工作动力，导致贫困代际传递。“我们多次劝导都没有用，父亲喜欢打牌，导致儿子也受影响天天跟着打牌，两代人都不好好干活挣钱。”（访谈记录：HY县S村村支书20200817）如果说家庭文化与价值观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影响，那么村庄文化与风气则是一种外在的文化影响，它是在村庄范围内形成的氛围与风俗，村庄精神文化容易受到赌博、喝酒、彩礼习俗、攀比、早生早育现象等侵蚀，造成文化贫瘠。在调研过程中，一些村村民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普遍存在早婚早育情况，超生现象严重，0~15岁人口比例甚至高达48.2%。内外贫困文化的影响会加剧农村家庭对原有生活模式的延续，内生动力的不足会使他们更加依靠外在的帮扶，产生福利依赖，缺乏自我发展的动力。贫困文化的根源在于接受教育的不足，农村家庭父母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对知识的认可度不高，导致对下一代的教育期望过低，产生“教育放弃”的行为。教育期望与教育成就相互强化，当父辈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改变现状时，其子辈往往会获得更多的教育，未来的收入也会相对较高。否则，子辈的教育期限会缩短，过早的投入到低技能或低报酬的工作中，更加难以跨越低收入阶层。

如果说贫困文化是农村家庭自我阶层的认知，那么社会排斥则是指其他阶层对农村家庭的态度导致农村家庭成员的资源和发展机会被剥夺的感知。尤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农村家庭的父辈与子辈在与城市人接触时会被排斥或不被接受。“我们在城里打工，经常会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受他们的气，有时还会对我们产生猜疑。他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孩子也不礼貌，嫌弃我们的孩子。”（访谈记录：HY县J村村民20200812）在乡村内部也存在政治上的排斥，具体表现为话语权缺失，农村贫困家庭的成员没有实现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村里的很多事情我们插不上嘴，即使说了，也没人会听，基本上都是村干部说了算。”（访谈记录：BD县J村村民20191024）

（二）情景维度促进个人微观层面行为驱动因素形成

情景是指农村家庭父辈与子辈行为发生时与机体本身有关的因素。根据扎根理论可知，个人层面的情景维度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这5个驱动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生计资本。人的经济行为是镶嵌在社会心理和国家制度之中的，在诱因驱动下产生一系列行为，并影响结构因素或受结构因素的响应。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是在5个资本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驱动因素一是自然资本，它是农村家庭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调研中发现，因特殊原因，家庭成员无法出外打工，基本靠土地获得收入。“农民祖祖辈辈靠土地吃饭，两辈都贫困的家庭基本上是老弱病残，没有出去打工的机会，只能在家种地或养殖，但现在农民的地也少了，粮食遇上不好的年份也卖不上价格，一家子的收入也很少。像我们村就有正宗的野生食用菌，在街上一般买不到。苦有好的资源，却没有销路。”（访谈记录：JN县县扶贫办L副主任20190816）。除此之外，环境的好坏，如水资源的质量也会对农村家庭两辈人产生影响。“这个村里的河水以前是化工厂的下游，污水都排到这个河里了。以前大家不重视，照样喝河水里的水，有很多家庭的人得了癌症。王军一家本来是一个多好的家庭，后来女儿查出癌症，什么也不能做，父母也在家不能出去了，陪着女儿定期看病，一家就这样垮下来了。”（访谈记录：BD县HNA村村民20181025）

驱动因素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具体表现在知识与技能欠缺、无劳动力、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大部分农村贫困家庭的父辈没有接受过良好

的教育,不愿为子辈投资教育,认为教育的回报率较低,因此子辈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短,无法从事高技能或高收入的职业,父辈以牺牲子女的人力资本发展为代价让子女为家庭创收,导致他们重复父辈的贫困遭遇。另外,当农村家庭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时,如发生疾病遗传、弱劳力和半劳力人口较多、遭遇突发变故等,整个家庭就会入不敷出,最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现象。

驱动因素三是物质资本。物质资本的匮乏主要体现在住房水平较差和耐用消费品较为破旧或缺乏。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没有资金去改变居住条件,导致家庭里多代人的生活居住条件都很恶劣,尤其体现在住房水平上,而且具有贫困恶性循环的特征。在调研中,扶贫干部多次谈到农村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如“张招娣,45岁,丈夫因打工时摔下来卧病在床。一个孩子在上学,两个孩子精神有问题只能天天待在家里,婆婆80多岁卧病在家,全家只有她一个劳动力。他们家才搬到危房改造的新家不久,因没有钱家里的墙壁没有粉刷,玻璃和门都没有安装,进到屋里就感觉一股凉气。”(访谈记录:ZA县县驻村干部H20190113)

驱动因素四是金融资本。农村家庭的金融资本包括储蓄、信贷和债务。农村家庭的储蓄很少,甚至是没有,常常需要借款来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虽然国家实施小额扶贫贷款政策来帮助他们发展产业,但他们却将这部分贷款用于消费或填补债务,没有起到发展产业的作用。因此,储蓄少、有欠款、信贷随意消费是有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家庭所具有的特征。

驱动因素五是社会资本。因农村家庭所在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导致其缺乏社会资源和人脉,亲属关系和人际关系较为淡漠。他们在“向上”的交往中面临阻碍与困难,无法通过“跨层”交往来获得稀缺资源和发展机会,甚至是子辈也会有相同的境遇。

(三) 规范维度促进国家宏观层面的结构驱动因素形成

规范是指农村家庭采取某一行为时所受到的来自外部主体和环境的影响及压力。结构是整合了各种规范和资源的不断再生产的结果。结构内在于人的社会行动,对行动具有约束性和使动性。农村家庭成员在生产出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通过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再生产出行动的条件。本研究中国家层面的结构驱动因素主要指就业创业政策和社会结构。

当就业与创业政策对农村家庭没有真正起到增收与创收效果时,或者农村家庭没有享受到就业与创业政策时,农村家庭的贫困状态仍会持续,无法彻底改变两辈人的贫困。本研究中的就业与创业政策指人才培养政策和产业化政策。人才培养政策通过实施技能脱贫,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对贫困家庭的劳动力进行岗前培训以提高其劳动技能,并发放相应补贴。国家制定了相应的人才培训政策,但是在基层实践过程中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村贫困家庭派人去参加了技能培训并拿到了结业证书,但父辈与子辈掌握的就业信息较为闭塞,有技能却没有就业渠道,两代人仍然维持在贫困的状态。”(访谈记录:BD县驻村干部H20191021)产业化政策能更持久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通过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可进行相应产业的培育、营销和推广。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产业化政策没有使农村贫困家庭有稳定的工资收益和农业产业链增值收益,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没有发生改变。

社会结构包括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直接表现为城乡制度差异,对贫困家庭产生重要影响。城乡制度差异主要体现在户籍、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使得农村家庭享受不到城市家庭拥有的权利,在面临风险冲击时,极易使整个家庭陷入贫困,并有可能将这种贫困传递给下一代。人口结构主要指年龄结构,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农村家庭,一大部分都有无劳动力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这样的人口结构造成劳动力缺乏,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导致整个家庭陷入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我儿子因为车祸意外死了,儿媳妇没过多久就跟着别人跑了,丢下孙子也不管。现在我和老伴儿养孙子,日子过得很困难。”(访谈记录:HY县XSZ村村民20200822)

六、总结与讨论

在当前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如何在巩固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帮助农村家庭找到致贫的关键因素，消除贫困代际传递，对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探究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是什么及这些影响因素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本研究利用多方访谈资料进行扎根探索，构建了“社会层面的诱因驱动因素—个人层面的行为驱动因素—国家层面的结构驱动因素”多维整合模型。

贫困文化、社会排斥构成了诱因驱动因素，对农村家庭两代或多代人产生深刻的认知影响。贫困文化是内在诱因驱动因素，它是长期形成的内在的、消极的、具有阻碍作用的深层次思想，在贫困家庭内部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与遗传性，通过世代传递而逐渐加强。社会排斥是外在诱因驱动因素，它是因阶级、地位而产生的社会分化，进而导致遭遇歧视、偏见和不公平的对待，贫困家庭逐渐被边缘化与孤立化。在个人层面，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这五个行为驱动因素形成了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情景。在这五个可由农村家庭操作的生计资本中，导致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最多的因素分别是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因为当这些资本缺乏时，就会形成因病因残因灾等形成的贫困代际传递情景，这也是农村家庭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最常见原因。国家层面有就业与创业政策、社会结构这两个结构驱动因素，它们将权力融合在准则之内，并使之常态化，在规范层面促进或抑制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实现了强化的目的。在中观、微观、宏观这三个层面中，它们并非单个独立作用于农村贫困家庭，而是相互影响、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共同促进或抑制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

第二，本研究对要素短缺理论和贫困文化理论具有一定的回应，推动了共同富裕视阈下我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本土化理论研究。

个人层面的行为驱动因素和社会层面的诱因驱动因素回应了要素短缺理论和贫困文化理论，而国家层面的结构驱动因素推动了本土化的理论研究。不同于西方国家，在我国权威型特征明显的环境下，中央和地方的政策会对农村家庭成员产生导向和激励作用，使他们激发内生动力，提高个人能力，进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因此，如何使政策执行产生更好的效果，是接下来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

为了有效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在个人层面提升农村家庭的生计资本。通过增加相应的生计资本，提高父辈和子辈在面对重大风险时的抵御能力，降低生计资本的脆弱性，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发生。第二，在社会层面，改变贫困文化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激发农村家庭内生动力，提升致富能力，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减少社会排斥，构建和谐社交网络，加强人际互动，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第三，在国家层面，完善促进创业就业的长效机制，确保劳动者享有公平的待遇和良好的发展条件。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等政策配套措施，支持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推动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通过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提高贫困家庭的工资等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保障等非财产性收入，进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参考文献

- [1] Oscar, L.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59.

- [2]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2021(9).
- [3] 黄承伟. 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及理论议题[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4] 傅夏仙,黄祖辉. 扎实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1-25(001).
- [5] 李实,陈基平,滕阳川. 共同富裕路上的乡村振兴:问题、挑战与建议[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6] 夏英,王海英. 实施《乡村振兴促进法》:开辟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J]. 农业经济问题,2021(11).
- [7] 侯银萍.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5).
- [8] 黄祖辉,叶海建,胡伟斌. 推进共同富裕:重点、难点与破解[J]. 中国人口科学,2021(6).
- [9] 张兵.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发展轨迹及其趋向[J]. 理论学刊,2008(4).
- [10] Becker, G. S., N. Tomes.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6).
- [11] Gary, S.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3).
- [12] Gary, S.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3).
- [13] Gary, S. A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variation over time and place[A]. Corak, M. *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4] 卢盛峰,潘星宇. 中国居民贫困代际传递:空间分布、动态趋势与经验测度[J]. 经济科学,2016(6).
- [15] 张立冬. 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6).
- [16] 王海港.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J]. 经济科学,2005(2).
- [17] 杨沫,王岩.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J]. 管理世界,2020(3).
- [18] 马文武,杨少垒,韩文龙. 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实证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2018(2).
- [19] 肖殿荒,毕艳成,王姝力. 中国农村家庭代际贫困传递及演化趋势[J]. 上海经济研究,2018(12).
- [20] Reiter, D., M. T. Palz, M. Kreime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success in Austria with a focus on migration and gender[J]. *Journal for Labour Market Research*, 2020(6).
- [21] 杨娟,赖德胜,邱牧远. 如何通过教育缓解收入不平等? [J]. 经济研究,2015(9).
- [22] 李晓明.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述评[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2).
- [23] Jiao, X., M. Pouliot, S. Z. Walelign.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dynamics in rural Cambod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7(9).
- [24] Clootens, N. Public debt,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Modeling & Assessment*, 2017(3).
- [25] Andergassen, R., F. Nardini.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atus in a model with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trait inheritance[J]. *Macroeconomic Dynamics*, 2019(3).
- [26] Brown, H.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policy on inequalitie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in health and wages: Evidence from the UK from 1991—2017[J]. *PLOS ONE*, 2020(6).
- [27] Dutta—Gupta, I., K. Grant, J. Kerkisick, et al. Working to reduce poverty: A national subsidized employment proposal[J].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8(3).
- [28] 苏芳,马南南,宋妮妮,等. 不同帮扶措施执行效果的差异分析——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 中国软科学,2020(1).
- [29] 曹军会,朱玉春.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
- [30] Robertson, F. Challenging the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obaccos smoking: A novel harm reduction approach in vulnerable families[J].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2017(1).
- [31] Bird, K., I. Shinyekwa. Even the ‘rich’ are vulnerable: Multiple shocks and downward mobility in rural Uganda[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05(1).

- [32]McKernan,S. ,C. Ratcliffe, S. R. Cellini. *Transitioning in and out of Poverty(Fact Sheet No. 1)*[R]. Washington,D. C. ;The Urban Institute,2009.
- [33]潘星宇,卢盛峰. 阻断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基层政府支出政策更有效吗?[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1).
- [34]邓锁. 贫困代际传递与儿童发展政策的干预可行性研究——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实证调研数据[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2).
- [35]Villa,J. M. The continuous treatment effect of an antipoverty program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olombia's Familias en Accion[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8(3).
- [36]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 [37]朱丽叶·M. 科宾,安塞尔姆·L. 施特劳斯. 质性研究的基础: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M]. 朱光明,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Rural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 Exploratory Analysi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WU Qian

Abstract: Rural low-income families are not only the key assistance objects for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middle-income groups. On the basis of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inding the key factors that lead to poverty in rural families and block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s an indispensable requirement to prevent class solidificatio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ocial-level incentive drivers, the individual-level behavioral drivers, and the national-level structural drivers pass through the “cognitive-situation-normative” t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rural families. This study helps to discove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rural households and the theoretical logic behind the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fluencing factors; grounded theory

(责任编辑 周振新)